

公平、质量和竞争力：菲律宾高等教育政策分析

陈奕诗^{1*}, 李曼玲¹, 陈前瑞¹

(^{1*}马来西亚英迪国际大学, 马来西亚 森美兰州汝来镇 71800)

摘要： 本文对菲律宾高等教育政策进行批判性研究，重点分析其背景、政策目标、主要挑战、社会经济与政治影响及整体成效。基于 Bardach 政策分析框架，本研究评估了《全民优质高等教育法》（第 10931 号共和国法案）的实施效果及高等教育委员会（CHED）主导的各项举措。分析发现，在入学机会、教育质量、公平性及国际竞争力方面存在不足，尤其对农村和边缘化群体的影响更为显著。通过与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的对比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在入学机会、质量保障及劳动力市场对接方面的政策差异。研究最后提出针对性建议，旨在通过加强质量管控、促进高校与产业界合作、推进数字化转型、提升科研能力及完善机构治理，为菲律宾构建更具包容性和前瞻性的高等教育体系提供解决方案。

关键词： 公平与准入；质量保证；国际化；政策有效性；比较教育；Bardach 政策分析框架

Fairness, Qua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Analysis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ies in the Philippines

CHEN Yishi^{1*}, LI Manling¹, CHEN Qianrui¹

(^{1*}INT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Malaysia, Bandar Baru Nilai, Negeri Sembilan, 71800, Malaysia)

Abstract: This study conducts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ies in the Philippines, focusing on their contextual background, policy objectives, major challenges,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impacts, and overall effectiveness. Utilizing Bardach's Policy Analysis Framework, the research evaluates the implementation outcomes of the Universal Access to Quality Tertiary Education Act (Republic Act No. 10931) and initiatives led by the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CHED). The analysis reveals deficiencies in accessibility, educational quality, equit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particularly affecting rural and marginalized populations.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ies with Indonesia and Cambodia, further disparities in access policies, quality assurance mechanisms, and labor market alignment are highlighted. The study concludes with targeted recommendations to enhance the inclusivity and foresight of the Philippin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cluding strengthened quality control, academia-industry collabor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capacity building, and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reforms.

Keywords: Equity and Access; Quality Assurance; Internationalization; Policy Effectiveness; Comparative Education; Bardach's Policy Analysis Framework

1. 背景分析

菲律宾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始终立足于国家的社会政治环境及其应对内外部压力的实际需

- 22 -

作者简介：陈奕诗（1994-），女，广东深圳，硕士，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李曼玲（1998-），女，浙江宁波，硕士，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陈前瑞（1999-），男，河南郑州，硕士，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通信作者：陈奕诗，通信邮箱：chenys2025@gmail.com

求。现行体系可追溯至 1982 年颁布的《教育法》（第 232 号法案），这部法律为后续改革铺平了道路，将机构自主权和因地制宜的响应能力置于核心地位。

1994 年迎来重大转折，随着《第 7722 号共和国法案》正式生效，高等教育委员会（CHED）作为统一监管机构成立，负责管理高等教育事务。这项“三权分立”改革将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分离，为制定更专业的政策法规铺平道路。在高校入学人数激增、院校结构日趋多元化、全球竞争力需求持续攀升的背景下，成立高等教育委员会成为应对挑战的明智之举。

菲律宾对“全民教育”（EFA）倡议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4）等国际方案的承诺，也深刻影响了其政策走向。这些国际方案强调为所有人提供包容性、公平性的优质教育及终身学习机会。在此背景下，菲律宾的国家转型日益重视改善教育可及性、促进性别平等，并提升学习成果，以契合上述国际承诺。

另一项重要改革是 2017 年颁布的《全民优质高等教育准入法案》（第 10931 号共和国法令）。该法案规定公立大学、地方大学及国有职业技术学校可免除学费及其他费用（第 10931 号共和国法令）。

Manasan (2024) 认为，其核心目标在于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缩小社会经济差距并促进社会流动。尽管高等教育机构的招生规模持续扩大，但教学质量保障、资源维护与合理分配等问题仍需关注^[1-1]。

以菲律宾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为例，学生与教师的流动、海外学位认证以及跨国合作研究等发展举措，已逐步纳入国家政策框架。如今国际化的推进被视为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创新突破、助力菲律宾融入全球知识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这些进程持续影响着菲律宾高等教育领域当前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2. 政策目标和目的

菲律宾高等教育政策的总体愿景是建立一个可及、公平、高质量且能响应国家和全球发展需求的教育体系。这一愿景在《优质高等教育普及法案》（RA 10931）和《高等教育委员会 2022-2028 战略计划》等重要政策中得到了明确阐述。尽管许多国家在提供包容性教育方面存在困难，但菲律宾于 2017 年颁布了《优质高等教育普及法案》（RA 10931），Manasan (2024) 表明，这旨在增加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入学人数^[1-2]。

2.1. 提高高等教育的可及性

菲律宾高等教育政策的根本目标在于实现高等教育的民主化，即为经济弱势群体提供教育机会。这一目标通过《全民优质高等教育法》（第 10931 号共和国法案）得以制度化，该法案取消了公立大学的学费及其他杂费。此举旨在消除长期阻碍弱势群体学生入学的经济障碍。免费教育政策配合高等教育补贴及支持计划，旨在提升入学率并促进代际社会流动。自政策实施以来，入学人数呈现爆发式增长，尤其在低收入群体中表现突出，《全球经济》杂志对此进行了报道^[2]。

2.2.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该政策的另一重要目标是全面提升高等教育体系的教学水平与机构效能。Syed 等 (2022) 阐明，为确保符合国际最佳实践标准并满足就业市场需求，政策重点推行了基于成果教育（OBE）等质量保障机制、院校分类体系及定期认证制度^[3]。这些举措既致力于深化能力本位教学改革，又有效回应了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的关切。尽管部分资源匮乏院校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差异，但高等教育发展委员会（CHED）的战略规划仍将提升全国范围内的教学效能、优化课程设置及完善学习基础设施作为重点发展方向。

2.3. 促进公平与包容

教育平等始终是国家教育政策的核心原则，政府通过具体措施为弱势群体提供支持。政府扩大了奖学金计划的覆盖范围，包括高等教育补贴（TES），帮助女性、原住民社区和残障人士实现高等教育梦想。这些计划旨在消除长期制约教育参与的社会文化^[4]与经济鸿沟。Bayudan-Dacuyucuy 等 (2024) 指出，尽管入学率呈现上升趋势，但结构性差距依然存在，尤其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然而，将教育视为基本人权的

承诺始终是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核心主题^[5-1]。

2.4.与国家发展目标保持一致

菲律宾高等教育被视为实现《我们的国家愿景 2040》中关于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裕中产国家的国家战略的核心驱动力。高等教育机构不仅肩负培养优质毕业生的重任，更要成为创新引擎、地方发展推手和经济韧性保障者。Quimba 等(2024)阐述，政府强调要优先投入科研经费、培育创业孵化项目并推进知识转移计划，这要求高校必须成为国家发展计划的主力军^[6]。这些理念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4 (SDG 4)——即普及普惠公平的优质教育等全球化发展路径不谋而合^[7]。

2.5.提升全球竞争力与国际化

菲律宾教育政策进一步明确指出，毕业生必须具备在国际互联的劳动力市场中竞争的能力。为此，该国将跨境学术交流、合作研究以及信息通信技术准备等领域的优先发展地位提升至更高层级。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化进程包含合作协议、双学位项目及远程教育能力建设。国际化已不再是次要目标，而是东盟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实现经济扎根、人才培养和机构声誉的战略支点。

2.6.基于 Bardach 框架的政策评估标准

Bardach (2012) 政策分析框架的第四步“选择评估标准”为菲律宾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决策提供了理论基础^[8]。该国教育政策主要遵循四大准则：有效性、效率、公平与政治可行性。其中，有效性通过毕业生就业率和院校质量等具体指标量化评估；效率则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金实现，特别是推行绩效预算制；公平始终是道德责任与发展需求的必然要求；政治可行性则体现在政策获得广泛民众支持，并与立法要求保持一致。这些要素共同确保政策既接地气又切实可行，同时能灵活应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3.教育挑战

虽然近年来的改革提升了菲律宾高等教育的可及性，但仍然存在若干重大挑战，影响着整个教育体系的绩效，其中包括机会不均、质量参差、技能与就业市场不匹配，以及尽管有政策倡议，但研究能力有限，上述问题使得这些改革举措的长期成效仍有待进一步检验。

3.1.教育机会和参与的持续不平等

尽管《全民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法案》(RA 10931) 已颁布多年，但高等教育的准入门槛与资源分配仍存在显著不平等。偏远地区、农村及原住民学生长期面临系统性困境：交通不便、优质中等教育机会匮乏、本地高校基础设施薄弱。Chao (2022) 研究表明，公立高校的学费减免政策未能消除交通费、住宿费和网络使用费等隐性支出，这些额外开销成为贫困家庭的沉重负担^[9]。结构性不平等导致全民教育普及率增长缓慢，入学率提升也明显偏向城市地区——这些区域的教育机构资源更充足、办学能力更强。

3.2.高校质量参差与认证差距

菲律宾高等教育机构的质量参差不齐。大多数高校，尤其是小省份的院校，仍存在课程体系陈旧、师资力量薄弱、科研产出有限等问题。尽管菲律宾高等教育委员会已建立成果导向型教育体系和质量保障分类标准，但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数据报告》显示，这些措施的落实效果参差不齐，仅有少数院校通过了认证^[10-1]。

这种差异不仅损害了教育体系的公信力，更加剧了地区间毕业生能力与就业竞争力的失衡。世界银行 (2022) 数据显示，由于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脱节，仅有不到半数的毕业生能在所学领域找到工作^[11-1]。

3.3.毕业生失业与技能脱节

菲律宾高等教育体系的根本症结在于学术培养与就业需求之间的系统性脱节。多数毕业生虽掌握理论知识，却缺乏现代产业所需的实践技能、软实力等硬核能力。企业反馈显示，高校教育培养的技能与职场需求存在日益扩大的鸿沟，尤其在科技和数字领域。这种供需失衡导致第一代

大学生群体普遍面临就业不足、工作满意度低落及薪资停滞的困境。此外，校企合作机制的缺失也制约了课程设置的灵活性，难以及时响应经济发展的新需求。

3.4.研究创新能力不足

Gamboa (2024) 指出，菲律宾的研究产出仍高度集中在菲律宾大学 (UP)、马尼拉雅典耀大学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和德拉萨大学 (De La Salle University)^[12]。大多数高校既未获得科研经费支持，也缺乏指导资源和实验设施，难以开展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或开展国际合作。尽管高等教育发展委员会 (CHED) 和科技部 (DOST) 主导了资助计划，但申请门槛依然过高。由于发表的同行评审期刊数量有限、专利成果稀少，加之全球影响力不足，菲律宾在知识创造与创新指标上的表现持续欠佳。

3.5.数字鸿沟和在线学习差距

新冠疫情暴露出菲律宾教育系统的科技短板。由于数字基础设施薄弱、教师培训不足，以及学生在电脑使用和网络连接方面存在巨大差异，高等教育机构在推行在线及混合式教学时遭遇困境。这些问题对弱势群体和偏远地区的学生影响尤为严重，进一步加剧了本已存在的教育不平等。尽管数字化转型是政策重点，但实际实施却缺乏系统性规划，高度依赖地方资源和机构指导，导致主要居住在农村或边缘化地区的学生产生更多问题。

3.6.人才流失与人才外流

长期以来，菲律宾高等教育领域一直面临着毕业生为寻求海外更好就业机会而持续外流的复杂难题。传统数据显示，菲律宾拥有流动性极强的专业技术工人群体，尤其集中在医疗、教育及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尽管这种流动带来了大量侨汇收入，但也反映出国内劳动力市场无法充分吸纳与合理回报高技能人才的现实困境。Jurij (2025) 等研究表明，由此引发的“人才流失”不仅制约国家发展，更削弱了机构效能——特别是在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中，师资队伍的稳定问题日益凸显^[13]。

3.7.基于证据揭示的结构性挑战：Bardach 政策分析框架的应用

所有这些问题都记录在官方统计数据、国际报告以及菲律宾高等教育体系的国家评估中，这些评估均遵循 Bardach 政策分析框架的第二阶段，即建立证据关系。世界银行、高等教育发展委员会战略文件及劳动力调查共同揭示了发展模式不均衡、结构性不平等和制度性瓶颈未解的现状^[11-2]。尽管第 10931 号共和国法案及相关改革扩大了入学机会并创造了突破性创新，但其在解决质量、公平性和相关性等长期存在的问题上，充其量只能起到部分作用。这凸显出需要采取更细致、多维度的政策策略，从单纯关注入学机会转向注重长期成效与机构韧性建设。

4.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

菲律宾高等教育政策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及政治生活密不可分。Balarin (2022) 表明，在菲律宾及众多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不仅承担着培养就业人才的特殊使命，更通过产业合作、科研攻关、国家发展等多重维度，致力于培育社会关键型人才^[14]。作为国家战略工具，高等教育肩负着消除贫困、提升人力资本、推动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双重使命。

4.1 社会经济影响

菲律宾高等教育长期被视为经济增长、扶贫和社会和谐的主要引擎。2017 年颁布的《第 10931 号共和国法案》取消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学费及其他强制性费用，实际上为贫困家庭（包括原住民和残障人士）打开了大门。因此，2018 至 2021 年间公立院校入学率增长了 9.6%，其中收入最低五分之一群体的增速尤为显著^[10-2]。然而这种快速增长也加剧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高校因设施完善、师资充足，更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而农村院校则因资源有限举步维艰。这形成了一个与改革公平目标背道而驰的双轨体系。此外，就业市场吸纳能力依然疲软——仅有 47% 的菲律宾毕业生从事本专业工作，反映出长期存在的学术培养与就业机会错配问题^[15]。

数字鸿沟加剧了这些社会经济困境。Saleh (2023) 等人指出，新冠疫情下的在线学习暴露

出巨大的技术差距，尤其在农村或贫困地区的学生群体中尤为明显——他们大多缺乏电脑、网络带宽和专业培训的教师^[16]。这些技术缺口不仅扩大了教育差距，还限制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尽管数字化转型已被列为国家优先事项，但其应用不均衡仍折射出深层次的结构性不公。此外，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灾害加剧，正日益扰乱教育供给，特别是在脆弱地区。正如 Chong 等人（2025）所指出的，对基础设施和气候适应规划的长期投入，已成为保障教育连续性和公平性的关键所在^[17]。

4.2 政治影响

菲律宾高等教育政策的发展轨迹直接受政治进程、领导层更迭及制度性治理架构的影响。在杜特尔特执政期间，第 10931 号法案的成功实施主要得益于政治推动力和民众改革呼声的双重推动，这表明在财政与行政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行政支持仍可能超越雄心勃勃的政策。然而，这种成果也显得脆弱易变，政治波动可能侵蚀政策连续性或阻碍执行。Abbott（2020）研究表明，这种不稳定性还体现在公共支出分配、大学校长选拔以及学术议程转向等方面——这些领域往往沦为民粹主义或党派利益的牺牲品，而非长期国家利益的守护者^[18]。

尽管高等教育委员会（CHED）在技术层面保持自主，但在一定程度上仍易受更广泛政治压力的影响。在高校地位认定、资金分配和课程改革等关键决策中，有时会优先考虑这些事项而非政府的既有政策。科研经费与开发资助的分配方向同样受政治力量左右，偶尔以牺牲学术自由和循证政策为代价。与此同时，政策领域也面临国际压力。正如 Parameswaran（2025）指出，东盟及印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调整，推动高等教育机构走向全球化并接轨国际学术规范。跨国对标与区域流动计划使本土院校在行政管理与教学创新方面受限^[19]。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师资队伍与课程设置需求，但受限于预算水平和治理机构的迟缓反应。

5. 政策有效性

菲律宾高等教育政策的评估可采用若干定量和定性措施，这些措施以国家和全球信息为基础，如 CHED、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5.1 评估机会和公平

《全民优质高等教育法》（RA 10931）因显著提升菲律宾高等教育普及率而备受赞誉。Manasan（2024）数据显示，2018 至 2021 年间公立高校入学人数增长 9.6%^[1-3]。低收入群体的增幅最为明显，这表明该政策成功消除了学费这一障碍。配套资金机制如学生经济援助计划和高等教育补贴（TES）有效提升了原住民、残障人士等传统弱势群体的入学率。但 Martinez（2021）^[20]认为，公平性问题依然存在：多数贫困学生仍需承担交通费、伙食费及文具费等补贴未覆盖的间接支出。此外，免费教育优势仅限于城市高容量院校，农村地区低容量高校通常难以扩招。这种机构准备度的不均衡导致学习机会极度不均，未能实现“包容性”教育目标。政策的“目标”，要求在项目执行中更加重视地理和社会经济差异。

5.2 评估质量和相关性

菲律宾高等教育质量受 RA 10931 法案影响程度参差不齐。菲律宾高等教育委员会（CHED）推行成果导向教育（OBE）和于高校类型的质量保障体系，推动高校向能力本位课程体系转型和院校认证制度的转型，Yagong 和 Linux（2025）认为，这使得部分高校能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调整课程设置，提升学术公信力^[21]。但值得注意的是，Mistamiruddin 及 Nasri（2024）阐明，多数院校，尤其是省属院校，仍面临师资力量不足、技术设备落后、学术支持服务欠缺等瓶颈，导致改革难以有效推进^[22]。毕业生就业率问题尤为突出：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仅有 47% 的大学毕业生能直接从事与专业对口的工作，近三分之一的用人单位表示难以招到合适人选，这暴露出高等教育培养成果与企业需求长期存在脱节^[11-3]。此外，Singh（2023）发现，校企合作机制薄弱，实习项目、职业指导活动和课程体系不完善，为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而提前制定课程计划的做法在不同院校之间存在差异，且在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中被淡化^[23]。

5.3 研究和创新绩效

Cruz (2021) 等表示, 菲律宾高等教育的生产力仍集中在少数顶尖大学, 菲律宾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马尼拉雅典耀大学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和德拉萨大学 (De La Salle University) 在学术出版、国际合作与科研经费申请方面处于领先地位^[24]。这些高校凭借成熟的科研文化、强大的校际网络及优先获取的校外资金, 已经发展成为国家与区域的科研枢纽。除大城市外, 全国大多数高校甚至连开展研究的基本设施都缺乏。Gkrimpizi (2023)^[25] 阐述, 尽管高等教育委员会 (CHED) 和科技部 (DOST) 已推出资助计划以提升高校研发能力, 但由于师资经验不足、资源限制及官僚主义阻碍, 小型高校仍大多未能受益。科研能力的不均衡分布扭曲了国家科研政策的整体成效, 抑制了区域创新。要纠正这种失衡, 必须持续加大科研能力建设投资, 并为各层次高校的教师参与科研活动提供专项激励措施。

5.4 全球竞争力与高校排名地位

菲律宾在国际大学排名中表现欠佳, 既未入选 QS 亚洲大学排名, 也未进入《泰晤士高等教育》榜单; 即便上榜的院校排名靠后, 国际声誉也较为有限。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包括: 国际学生比例偏低、跨国学术合作不足、教师流动机制不完善。尽管政策文件鼓励国际化发展, 但实际执行效果参差不齐, 且主要局限于顶尖高校。部分顶尖院校虽推出了学术交流项目、双学位计划和区域合作, 但这些举措尚未形成系统性布局。Bayudan-Dacuycuy 等 (2024) 指出, 多数高等教育机构仍缺乏有效推进国际化的制度能力、资源支持和战略规划。若不能在政策协调与机构准备方面进行系统性改革, 菲律宾恐将在全球学术交流与竞争力方面进一步落后于其他东盟国家^[5-2]。

6. 比较讨论

为了更好地评估菲律宾的高等教育政策, 有必要与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进行比较分析。这两个国家同属东南亚地区, 社会经济环境相似, 但在高等教育政策路径和实践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具有可比性和启示意义。

6.1 高等教育的可及性与公平性比较

菲律宾通过《共和国法案第 10931 号》(RA 10931) 取消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学费, 并扩大贫困学生入学机会, 同时借助高等教育补贴 TES 等高等教育资助政策, 有效提升了高等教育普及率。然而 Manasan (2024) 认为, 农村地区的学院因缺乏配套基础设施, 难以支撑这一扩张计划, 导致政策的公平性目标未能实现^[1-4]。印度尼西亚, 其“KIP-Kuliah”奖学金采用经济状况审核机制, 而非无条件资助, 虽在公平性方面聚焦最贫困学生, 但整体可及性扩展有限。其“教育自由”政策通过提供多样化学习路径, 实现了更公平的教育成果, 尽管贫困地区间的入学差异依然存在。相比之下, 柬埔寨高等教育仍然实行私有化, 由于公共支出低和财政援助有限, 这使大众难以负担, 因此增加了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入学的重要决定因素。

6.2 教育质量、毕业生就业能力和劳动力市场相关性比较

菲律宾仍面临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对接的问题。但高等教育发展委员会 (CHED) 推行的成果导向教育计划实施效果参差不齐, 仅有 47% 的毕业生能从事专业相关工作, 这反映出技能错配现象持续存在且产教衔接薄弱。相比之下, 印度尼西亚的“自由校园自由学”政策更注重实习和实践教学, 不仅提升了毕业生就业竞争力, 还加强了高校与产业界的联系。柬埔寨缺乏完善的监管体系, 导致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教学质量参差不齐, 同时存在大规模就业不足现象。实习机会有限且雇主参与度低, 进一步削弱了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由于国家层面的就业政策仍处于起步阶段, 这一问题更加凸显。

6.3 科研、国际化和全球地位比较

菲律宾的研究生生产力与全球化进程, 始终扎根于以菲律宾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马尼拉雅典耀大学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和德拉萨大学 (De La Salle University) 为代表的精英学府组成的紧密同心圆。这些顶尖学府不仅主导着学术产出, 更在国际协作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尽管高等教育发展委员会 (CHED) 和科技部 (DOST) 持续提供资

金支持，但区域高校因缺乏资源支撑难免落后，而国家人才流动计划也主要惠及资源更雄厚的院校。印尼通过政府奖学金和国际合作项目，在区域合作层面展现出更高层次的参与度，为参与东盟计划创造了更多空间；Du（2022）研究发现，其学术研究相对分散，但远程教育、跨境教育及英语授课模式的普及，显著提升了该国学者群体的国际影响力^[26]。Heng（2023）研究表明，柬埔寨在这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其教育机构大多规模有限，难以开展深度研究；跨国合作项目寥寥无几，且多为松散的捐助方发起型合作；国际流动与学术协作规模有限，导致该体系与全球学术网络形成有效隔离^[27]。

7. 结论和建议

7.1 结论

菲律宾高等教育政策在扩大入学机会和促进公平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特别是通过《共和国法案第 10931 号》（RA 10931）和奖学金计划。然而，由于资源分配不均、数字鸿沟以及研究能力不足，将这种普及性转化为就业竞争力、教育质量与包容性仍面临挑战。与印尼更紧密的产业联系及柬埔寨对私有化的谨慎过度依赖形成鲜明对比，菲律宾当前亟需聚焦于缩小实施差距、消除区域内部差异，并强化机构优势，以确保其教育改革不仅具有包容性，更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具备抵御未来挑战的能力。

7.2 建议

加强质量保障机制：高校必须通过更严格的课程认证和持续监测来加强质量控制行动，特别是对非大马尼拉地区的高校。这将确保所有地区的学生都能享有同等的教育标准。

增强高校与产业界的联系：通过建立结构化的实习计划、用人单位的投入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反馈，必须确保高校与产业界之间有更多联系。这些措施可以减少毕业生就业不足的情况，并缩小长期存在的技能差距。

推进校园数字化建设与教师培训：尤其在农村及弱势地区高校，应推进教学设施的数字化建设及教师的信息化教学培训。推动混合式教学与教学科技支持系统，将有助于保障学习连续性并缓解数字鸿沟。

加强科研发展体系：需通过鼓励教师发表研究成果、发展区域创新集群，并推动科研资助下沉机制，以提升非精英高校的科研产出与创新能力。

健全法律和制度保障框架：必须建立更为稳固的法律与制度机制，以确保教育改革免受政治更迭影响。这包括将核心改革内容纳入国家发展法律体系，并促进教育界、产业界与民间社会之间的长期协作机制。

参考文献：

- [1] Manasan R. G. Assessment of recent Philippine education sector reforms and public spending on education[EB/OL]. SSRN, 2024.
- [2] The Global Economy. Philippines Tertiary school enrollment-data, chart[EB/OL]. 2024.
- [3] Syeed M. M.; Shihavuddin A.; Uddin M. F.; Hasan M.; Khan R. H. Outcome Based Education (OBE): Defining the process and practice for engineering education[J]. IEEE Access, 2022, 10: 119170–119192.
- [4] Philippine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Addressing gaps in the Tertiary Education Subsidy needed for equitable and quality higher education[EB/OL]. 2025-01-08.
- [5] Bayudan-Dacuycuy C. G.; Orbeta A. C. Jr.; Vargas A. R. P.; Ortiz M. K. P. An evaluation of the tertiary education subsidy program: Context, input, process, and product[R]. Philippine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2024.
- [6] Quimba F. M. A.; Barral M. A. A.; Andrada A. E. HEIGHTS-I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 Generating Holistic and Transferable Solutions[EB/OL]. Innovation Ecosystems, Philippines, 2024.
- [7] UNESCO. SDG 4 Data Digest: National education policies and the drive for equity[R]. Paris: UNESCO, 2022.
- [8] Bardach E. A practical guide for policy analysis: The eightfold path to more effective problem solving[M]. 4th ed. CQ Press, 2012.
- [9] Chao R. Y. Philippine higher education and ASEAN integration[C] // Zhang Y.; Goh K. (eds). Higher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Springer, 2022: 111–129.
- [10] UNESCO. Higher education global data report (Summary): A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Higher Education Conference 18–20 May 2022[R]. Paris: UNESCO, 2022.
- [11] World Bank. Improving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Equity and quality reforms[R]. 2021.
- [12] Gamboa C. EDCOM2 lists top 5 most research-productive, ‘top-tier’ universities in PH[EB/OL]. The EdLines, 2024-08-13.
- [13] Jurij R.; Sahuri S. N. S. Brain Drain, Education System, and National Power: Mapping Future Agend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and Strategic Studies, 2025, 6(10): 614-630.
- [14] Balarin M. Policy design and education governance in Peru: When increasing school autonomy and improving education quality collide[J]. Education, Citizenship and Social Justice, 2020, 15(3): 237–249.
- [15] World Bank. Developing socioemotional skills for the Philippines’ labor market[R]. 2022.
- [16] Saleh M. A.; Khan M. I.; Banerjee S.; Safi F. A tale of online learning during COVID-19: A reflection from the 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SAARC) countries[J]. Heliyon, 2023, 9(6): e16347.
- [17] Chong R. M. B.; Tangunan D. N.; Toyado D. M.; Elegado A. F. K. Evolving disaster resilience in the Philippines: Insights from the 2021 and 2023 World Risk Poll on socio-economic, regional, and systemic factor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25: 105415.
- [18] Abbott J. The Paradox of Participatory Institutions: Explaining the Limits and Potential of Large-Scale Experiments in Participatory Democracy[D]. Harvard University, 2020.
- [19] Parameswaran P. Southeast Asia in 2025: Geopolitics and Geoeconomics FuturePoints[EB/OL]. ASEAN Wonk, 2024-12-06.
- [20] Martinez A. Beyond the college bill: Hidden hurdles of indirect expenses[EB/OL]. Trellis Company, 2021-09-17.
- [21] Yagong M.; Linux D. Embracing Outcomes-Based education for quality instruction assurance[EB/OL]. ResearchGate, 2025.
- [22] Mistamiruddin E.; Nasri N. M. Challenges in Integrating Outcome- Based Education (OBE)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EB/OL]. 2024-11-11.
- [23] Singh J. K. N. Unequal opportunities in accessing employability - related programmes: South Asian graduates’ experiences in Australia[J]. Higher Education Quarterly, 2023, 77(3): 501–514.
- [24] Cruz A. D.; Gopez C. P.; Resurreccion A. D.; Magahis H. L. A. Viewing the Top Philippine

- Universities Through the Photographs on their Official Websites[EB/OL]. ResearchGate, 2021.
- [25] Gkrimpizi T.; Peristeras V.; Magnisalis I. Classification of Barriers to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J]. Education Sciences, 2023, 13(7): 746.
- [26] Du N. Intra-ASEAN Student Mobil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SEAN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Vietnamese Students in Indonesia[EB/OL]. ResearchGate, 2022.
- [27] Heng K. Challenges and developments in university research in Cambodia: a case study of two universities[J]. Higher Education, 2023, 87(6): 1593–1613.